



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,席卷了北京乃至整个华北。

从 1876 年~1878 年,整整三年,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,遭遇 200 年未遇的旱灾,死亡人数超过 1000 万,震撼整个世界。

这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,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。而出人意料的是,从来大灾必生大乱,但这次,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,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平静。

大清国这艘靠“裱糊”而艰难挣扎的航船,是如何渡过惊涛骇浪的?

# 清朝“三农问题”总爆发：抗灾 1876

## 人间地狱

这场大灾难实际上就是大清国“三农问题”的总爆发,是严厉的“天谴”……

灾难开始于 1876 年,光绪二年。

这一年,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,广东、福建两省损失尤重。而北方各省,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,出现大面积干旱,部分区域颗粒无收。随后,蝗虫扫荡了整个华北,一片狼藉。

第二年,华北旱情毫无缓解,蝗虫继续光顾。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,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十年前遭受战争灾难(捻军之战)的区域。山西和陕西两省,因交通困难,受灾尤重。“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,百姓像野兽似地互相掠食;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,70%的居民已经死亡了。(英国外交报告)”吃人已非个别现象,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,集体外出“狩猎”,将猎获的俘虏杀后烹食。中央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:“往来二三百里,目之所见,皆系鹄面鸠形;耳之所闻,无非男啼女哭。枯骸塞途,绕车而过,残喘呼救,望地而僵。”

陕西“赤地千里,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……饥民相率抢粮,甚至至于拦路纠缠,私立大蠹,上书‘王法难犯,饥饿难当’八字。”

灾荒如此严重,其原因固然首在“天灾”,但“人祸”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自内战平息之后,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,但官场腐败,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设。更为致命的是,平时常设的“常平仓”“社仓”“义仓”,因战乱频仍和官员腐败,出现了大面积的“亏短”,这导致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制度在灾难面前毫无作用。

“丁戊奇荒”发生后,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中央,请求从省外输送救济粮。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,河南本地的“常平仓”里应该有 95 万余石谷,却几乎是空仓。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,尽管报表年年做,“卫星”年年放,粮仓中却空如也。

滥种罂粟,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。鸦片之毒,大清国但凡有识之士无不切齿,但吊诡的是,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,从地方政府到农户,都大力种植这种“钱”途远大的“经济作物”。最好的田用于种鸦片,粮食生产则几乎完全被忽略,依赖从外地购买粮食。时人认定,这正是造成“丁戊奇荒”的重要原因。

“丁戊奇荒”,的确是“三农问题”的大爆发,是一次严厉的“天谴”。

## 紧急应对

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,强行启动,勉力而行,在动员社会资源、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,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……

灾难爆发之后,大清的行动相当迅速,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。

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,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“东方专制主义”,充满了反面评价。但是,在灾难面前,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、有效的动员能力。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,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“常平仓”系统后,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。他认为,明清时的中国,把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,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,从粮价、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(注: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),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,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程度。

“丁戊奇荒”爆发时,大清政府早已被之

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,“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”。但是,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,强行启动,勉力而行,在动员社会资源、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,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:

朝廷中央迅速下令,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,根据美国汉学家、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记载,中央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 1800 万两以上;

在李鸿章的统筹下,中央运用国家权力,调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,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,支援灾区;

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,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,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,开赴奉天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广等无灾区,对粮食进行大规模“政府采购”,并集中到天津;

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,中央给一点、地方筹一点、民间捐一点,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,甚至不惜挪用军费,甚至不惜加大“捐纳”力度——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,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,这并非“卖官”,而是“鬻爵”;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干部身份和干部级别的荣誉头衔,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。

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,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“平巢”上: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,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。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,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。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,认为“平巢同属救荒事无二致”。

比钱、粮更为棘手的问题,是运输。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,积压了大量粮食,难以及时转运。李鸿章集中精力,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,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了三条通道:北路在保定转运,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,换旱路经获鹿进入山西;中路在山东馆陶县转运,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;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,转经清化镇入晋。

在救灾过程中,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,将贪污腐化、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,参的参,罢的罢,关的关,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、有操守的干部。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。

救灾工作的推进、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,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,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,也是内战结束以来,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。

## 赈灾市场化

授人以鱼、莫如授人以渔。与别的赈灾官员不同,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数年的盛宣怀,试图为赈灾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机制。

1878 年 3 月,34 岁的“国企干部”盛宣怀,奉命赶回天津。李鸿章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:作为新成立的直隶筹賑局的干部,立即前往重灾区直隶河间府(相当于现河北保定地区),负责当地的赈灾工作。这次挂职锻炼长达 8 个月,并且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一进入河间府的府治所在地献县,受灾之惨况,令盛宣怀震撼了:“入献县境,即见饿民扶老携幼,乞食于道,风吹即倒。”

此时,大灾荒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。灾区现场早已是“疫病相染”,但盛宣怀为了防止“官賑”惯常出现的贪腐,坚持“挨户详查”。陪同他的当地“绅董”都不肯进入民户家中,担心“秽气所蒸,疫易传染”,他却总是“以身先入”。更令同行者震惊的是,为了体验灾民的生活,他甚至亲尝灾民家的所谓

“饭食”。有一次,盛宣怀前往巡视东光县某乡,“竞至露宿终夜”(《盛宣怀行述》),加上总在大风中步行,导致了“毕生喘疾”。

盛宣怀深入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,现场办理賑灾救济,不仅简化了赈济环节,而且提高了赈济的针对性。

授人以鱼、莫如授人以渔。与别的賑灾官员不同,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数年的盛宣怀,试图为賑灾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机制。

盛宣怀发现,献县“男妇向皆能织”,如能收购当地人的纺织品,就可以“稍济其生机”。他立即在献县创办了一家“纺织局”,并且在当地少年中选些稳重的人,为他们购置纺织机,教他们织布技术。收购上来的布匹,盛宣怀考虑可以带到东北,去换取粮食,或者可由军方收购作为军用,“彼此获益”。

献县设立纺织局,这是大清国賑灾思路的一次重大改革,大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“以工代賑”。之前的“以工代賑”,实际上就是官方出面对灾区劳动力进行“政府采购”,兴建水利、桥梁、道路等基础设施,既賑灾,又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,埋单的仍是财政。而盛宣怀的措施,实际上是“以商为賑”,财政只用少量的“种子资金”引路——盛宣怀动用了 2000 多两賑灾款购置织机,帮助灾区建立产销链,随后,这一产销链就能自己运作、自己生存。显然,这是从“政府賑灾”演变成了“市场賑灾”的尝试,按照李鸿章的说法,就是“养民不若令民自养”。更为可贵的是,盛宣怀又为灾区捐出“所积集金巨万”,其夫人也“典鬻珍物,尽出己蓄”。

## 防流维稳

“你若不救他,他亦不要命。左右一个死,做贼亦不定。”

设立“粥厂”,是大清国收容灾民的主要方式,目的十分明确,一是“救死”,二是“防流”——防止出现流民。显然,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,“防流”比“救死”更为重要,“救死”的目的也是为了“防流”。

所谓“凶年多盗”,大灾之后引起大乱,征诸中国历史,因流民暴乱而导致天下大乱,乃至内战大爆发的,不计其数。因此,以开办粥厂等賑灾方式来收容灾民,防止出现流民,是早在满清入关之前就已经在主流社会取得共识的牧民要术。所谓“流民者,饥民也。与其辑之于既流之后,不若抚之于未流之先。”(清代杨景仁《筹济编》)

“丁戊奇荒”中,灾民人数之众、范围之广、时间之久,史上空前,甚至连京城这样的地方,賑灾的速度也赶不上灾民的增长速度,“桀骜者沿街抢夺,舍命而不悔”。

参与山西賑灾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:“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,占领了它,在那儿生火做饭,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。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,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,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。”

各地虽然还未出现扯旗放炮、公然暴动的恶性事件,但是类似李提摩太所描绘的“吃大户”这样的小规模骚乱几乎天天不断,“盗匪”们甚至公然在官道上竖起大旗:“王法难犯,饥饿难当”。遍地的星星之火,虽然渺小,但一旦燎原,局势将不可想象。因此,从李鸿章到军机处,乃至皇帝、太后等中央核心,都深感“防流”的紧迫性,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賑灾力度,全力收容控制灾民。

对于流民的危害性,李鸿章十分清楚,他说:“北省伏莽甚多,匪徒乘机思逞,时需分投防剿。”对此,他采取了两手抓:一手抓賑济、抓抚恤,全方位、多渠道地筹粮筹款,不仅破天荒地接受外国的救助,而且还加大了“卖官

鬻爵”的“捐纳”力度;另一手抓收容、抓镇压,军队进入灾区进行戒备,“分路弹压巡缉”,令地方文武严密防捕,如有奸民藉荒纠缠,持械行强者,准即严正法以遏乱萌。”

为了减轻各地、尤其是京津地区的“粥厂”压力,李鸿章下令在寒冬过后,就必须给收容的灾民发放路费和粮食,遣送回乡,准备灾区的春耕播种。但是,这场大旱灾足足持续 3 年,耕种无望,没有饿死的灾民继续逃荒。这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“流民”风险,令大清政府的神经高度紧张。

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士绅们,与政府一拍即合,开始了对民间賑灾的大幅度改革,改变了传统“义賑”坐等灾民上门的做法,而是深入灾区,试图将“防流”工作从源头做起。

官方也意识到,依靠腐败丛生的“官賑”,难以有效賑灾、更难以有效“防流”。于是,政府开始加大对民间慈善机构的扶持力度。天津著名的广仁堂,就是在“丁戊奇荒”中,由李鸿章利用官绅捐款 1 万元创办,此后不断拨款支持,形成了包括慈幼所、蒙养堂、力田所、工艺所、禁节所、戒烟所在内的庞大机构。

## 民为邦本

在堪称人间地狱的“丁戊奇荒”中,民族主义意识鲜明地生长出萌芽,虽然极为狭隘,却依然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。

“丁戊奇荒”影响远及江南。此地自古便是国家财赋重地,每当有征战、有大工程,江南总要承担最重的负担。此次也不例外,不仅接纳了数百万难民,也是李鸿章筹粮筹款的主要基地。

而出人意料的是,向来坐等灾民上门的江南地区,此次在士绅们的带领下,走出江南,主动深入到华北灾区腹地,实行就地救助,开创了中国民间救助的先河。

在《申报》等媒体的推动下,奔赴华北救灾俨然成为江南的群众性运动,甚至波及南洋、日本、美国,捐款捐粮一时蔚然成风,志愿者们纷纷加入救助队前往华北,并且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谢绝了官方的任何奖励。

而在华北灾区,当地士绅虽然在经济实力、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,均不如江南士绅,也因为西方救援团队的介入,而激发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。西方传教士们不得不感慨:在当地士绅的鼓动下,灾民甚至拒绝接受洋人的救济粮和救济银。这种近乎极端的排外情绪,居然在已经上演“人吃人”悲剧的灾区中还能屹立不倒,当然成功地转移了灾民们对于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欲望。而且,在经历了之前多年的战乱之后,人们对安宁和平的向往并没有因灾难而消失。

这是一个相当吊诡的现象:在堪称人间地狱的“丁戊奇荒”中,民族主义意识鲜明地生长出萌芽,虽然极为狭隘,却依然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。这比学界普遍认为的甲午战争之后才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,提前了足足 20 年。

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,大清国的执政基础实际上大大扩大,超越了满汉的种族分界,而牢牢奠定了以孔孟之道为主的主流意识形态。在“丁戊奇荒”中,民间慈善成为精英阶级实践政治参与、维护主流社会价值的主要渠道,賑灾/收容不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,也是宣扬主流理念的绝佳渠道。对于大清政府来讲,在死亡千万的“丁戊奇荒”中,能成功避免大规模的有政治诉求的暴动,实在要感谢那些基于价值认同、而将自己的命运与政权捆绑在一起的“士绅”们。

雪珥